

“边缘人”的角色尴尬

——容闳在晚清中国的人生境遇

李细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 100006)

摘要 容闳是一个典型的“西化”人物,他受过全面系统的西学教育;可他仍然是爱国的,他有一颗赤诚的中国心。对于晚清中国来说,容闳本是不可多得的近代新型人才,但是,在那仍然重视传统科举功名的时代,作为“洋学生”的容闳实在难以介入晚清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他的爱国与报国的良苦用心也因此得不到世人的真正理解与支持。容闳在晚清中国社会以一个“边缘人”的角色,处境颇为尴尬,而这种尴尬的人生境遇,对他的事业有着严重的限制。

关键词 容闳;边缘人;人生境遇;角色尴尬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00)03-0116-05

在晚清中国历史上,容闳是与“西学东渐”分不开的,他在晚清中国西学东渐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容闳在晚清中国的人生境遇却是颇可耐人寻味的。他的脑子可谓是“全盘西化”(实为“美化”),但他仍然有着一颗赤诚的中国心。因此,他与现实中的中国总在若即若离之间:他一心想着将平生所学报效自己的祖国,可是他的祖国并不能真的接纳他。事实上,他在晚清中国社会以一个“边缘人”的角色,处境颇为尴尬,而这种尴尬的人生境遇,对容闳的事业有着严重的限制。

一、全盘“美化”

容闳于1828年出生于澳门附近的南屏镇(今属广东省珠海市)。当时的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为中西交流的要冲。1835年,7岁的容闳由父亲送到澳门,进入古特拉富夫人所设的“西塾”读书,这使他能

够在得风气之先的澳门一开始便接受了西学教育,奠定了此后全盘“西化”的基础。容闳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西方的,而且主要是美国的。他在古特拉富夫人的“西塾”发蒙,已“粗通西文”。1841年,进入澳门的玛礼孙学校(该校于1842年迁香港),深受校长美国人勃朗先生的影响。1847年,容闳随勃朗到美国,先入孟松学校读中学,再入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获学士学位。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面西学教育,使得容闳作为一个东方人的言谈举止与“内在的气质”都有了根本的变化,当他回到中国时,“觉得自己倒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似的”,“中国反倒像异乡。”^①容闳的“美化”程度,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略作分析。

首先,语言方面,“于本国语言,几尽忘之。”容闳18岁出国,在美国居住8年,而几乎将本国语言忘光,这确实有点令人费解。然而,据他自己的回忆,这是事实。当他第一次回国时,在香港海域的船上,竟不能用“中国语”翻译“暗礁与沙滩”,自己也颇觉尴

收稿日期 1999-11-08

作者简介 李细珠(1967-),男,湖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主要从事清末民初政治史、学术史和思想文化史研究。

尬：“自念以中国人而不能作中国语，亦无语以自解也。”后来，他不得不花了近半年的时间向一个美国传教士补习粤语。^②至于汉文，虽然他自称在留美之前学过四年，^③但终因根基甚浅，终生不能运用自如，日后所写条陈之类文稿只能请人捉刀代笔，而其生平自传也只能用英文写成。

其次，生活习惯的改变。容闳拖着辫子与穿着长袍到美国，直到进入耶鲁大学后才将其“割弃”，而改穿西装，并留短发。^④在美国，容闳学会了西方人的“文明”生活。当他回国初期在上海作洋行职员的时候，他的恩师勃朗先生访问了他，“发现他的生活方式与同公司的其他中国雇员不同，而感到惊奇与愉快。”据说：“这生活方式的不同是由居室看出来，因为其他中国雇员的居室的特征仍然是肮脏和臭味，而容闳的屋子是整洁的典范，桌子放了一些最美好的英文书，书架上排的书更多了，又有经典的著作还放在桌子上。”^⑤排除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偏见，这个事例表明了容闳的生活方式在西方人眼中的标准西化。

再次，自由精神的培养。自由是西方近代理性精神的特质。容闳的自由精神是由全面的西学教育所培养的。在容闳的回忆录中记载了两个典型的事例。一个是他在古特拉富夫人“西塾”的逃学。当时容闳在学生中年龄最小，古特拉富夫人为照顾他而让他与女生住在一起。“本为优遇，予不知其用意。男生等皆居楼下层，能作户外运动。而予与诸女生，则禁锢于三层楼上，惟以露台为游戏场。以为有所厚薄，心不能甘。常课余潜至楼下，与男生嬉。观彼等皆许自由出门，散步街市，而予等犹无此权利，心益不平。乃时时潜出至埠头，见小舟舫集，忽发异想，思假此逃出藩笼，以复我自由之旧。”^⑥此类“逃学”事件，本是小孩之顽皮与天真，而老容闳却以追求自由平等权利思想来诠释，则是颇有意味的。另一个典型事例是关于容闳在耶鲁大学的学费来源问题。1850年夏，当容闳考入耶鲁大学时，原来的留学资助已经到期而断绝，他必须得到新的资助，本来他所毕业的孟松学校可以提供这种资助，但必须答应一个条件，即立下“志愿书”，毕业后充当传教士。容闳婉言拒绝了这项资助，他认为：“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录用，不必遂大有为，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以竟吾素志。若限于一业，则范围甚狭，有用之身，必致无用。……况志愿书一经签字，即动受拘束，将来虽有良好机

会，可为中国谋福利者，亦必形格势禁，坐视失之乎？……盖人类有应尽之天职，决不能以食贫故，遽变宗旨也。”^⑦这是一种“很突出的独立自主精神。”^⑧在容闳看来，自由是人类的天性，可见，天赋人权的观念已在容闳的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

二、难以介入

19世纪50年代，封闭的中国刚刚被西方列强的大炮打开一个缺口，满脑子自由民主的观念，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西装革履的容闳，满怀爱国与报国的热情，回到中国，等待他的是怎样的命运呢？

当时的容闳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他在大学毕业之际，已在心中立下一个宏愿：“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⑨这是容闳此后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当容闳回国时，首先面临的便是生存问题。容闳在谋生的时候时刻不忘自己的理想，他说：“于时颇思于社会中得一职守，此非仅为家人衣食，欲有所藉手，达于维新中国之目的：谋食亦谋道也。”^⑩事实上，谋生对于容闳来说并不困难，他可以凭藉他精通英语英文的“一技之长”在港澳与沿海通商口岸作买办与译员的工作；但要实现他的理想就不那么容易了，他必须挤进中国上流社会，至少应该得到某些上流人士的理解、接受与援助，这对没有传统科举功名而又来历不甚明朗的容闳来说可就难了。尽管容闳总在努力争取时机，但都不尽如人意。下面拟简略描述他为此奋斗的过程。

首先，力图接近达官贵人而不能。容闳初回国时，首先到广州任美国派克公使（领事）的书记，“欲藉派克力识中国达官，庶几得行予志。”^⑪但很快便发现此路不通，仅三个月便辞职到香港学律师。当时香港已是英国殖民地，容闳受到英国律师的排挤而不得不离开香港。对此，容闳后来的解释颇为有趣，他认为“学律未成，为予生幸事”，因为“久居英国殖民地，身体为所拘束，不能至中国内地，与上流社会交游。”^⑫1856年8月，容闳离开香港到了上海，大概希图能“与上流社会交游”。他先后在海关与某英商公司任职，但都无出头之日。在他第四次失业后，他想“译书自食”，其目的也是“大可藉此以多识商学上流人物，推广交游，以遂予之第一目的。”^⑬通过译书，容闳成了上海闻名的中国留美毕业生。但是，直

到 1863 年见到曾国藩,容闳回国 8 年中并未真正地接近中国的达官贵人。

其次,访问太平天国的失望。容闳在上海的时期,太平天国正与清政府对峙。容闳一时无法接近清朝上流人物,转而投向了解太平天国。1860 年,容闳带着一大堆问题开始访问太平天国。“太平军中人物若何?其举动志趣若何?果胜任创造新政府以代满洲乎?此余所亟欲知也。”^①他在南京见到了干王洪仁玕,并向他提出七点建国建议,但并未得到真正的重视。容闳颇感失望,“予每见太平军领袖人物,其行为品格与所筹划,实未敢信其必成。”^②本来,他的南京之行抱有一线希望,结果却事与愿违。“南京之行,本希望遂予夙志,素所主张之教育计划,与夫改良政治之赞助,二者有所藉手,可以为中国福也。不图此行结果,毫无所得。曩之对于太平军颇抱积极希望,庶几此新政府者能除旧布新,至是顿悟其全不足恃。以予观察所及,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可断言也。”^③此后,容闳绝了以太平天国“维新中国”的念头。

再次,得到曾国藩等人的赏识,但并未被重任。1863 年某日,容闳得见曾国藩,自称是“初登政治舞台之第一日。”曾国藩对容闳的洋秀才才能颇为赏识,称其“熟于外洋事”,并委托他出洋“购买制器之器”,^④即采购机器设备。两年后,容闳不辱使命,为新兴的江南制造局购得一批重要的机器设备。曾国藩专折保荐容闳为江苏候补同知,官五品。容闳以此资格在江苏省行政署作译员,从此可以说正式进入中国官场。不久,容闳结识时任上海道随即升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两人“交颇投契”。正是由于丁日昌的多次推荐和曾国藩的最终首肯,才使容闳视为毕生最大事业的派遣留美幼童的“教育计划”得以实现。因此,容闳对曾、丁二人推崇备至,终生感激不已。但是,在组织留学事务所的班底时,容闳只任副监督,首任正监督为翰林出身的陈兰彬。丁日昌对容闳的解释是:“欲利用陈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也。”^⑤此后接任陈为正监督的区谔良、容增祥、吴子登,不是翰林出身,就是所谓“中国饱学之文士”;而精通西学的容闳始终只是副职。据容闳的记载,正是几位正监督的破坏,而使留学计划半途而废。因此,以翰林与旧学之士为正监督,与其说是为了减少守旧派的阻力,倒不如说是对容闳的某种限制,至少是一定程度上的不信任表现。否则,之后陈兰彬为驻美公使而容闳仍是副职又作何解释?

最后,对清朝政府的绝望。留学幼童被撤回国,对容闳的打击是异常沉重的。“毕生志愿,既横被摧残”,这是与其“同命之人”的爱妻去世相提并论的一生中“最不幸”的一件事情。1883 年他返回美国时,自以为“此身与中国政府,已永远脱离关系。”不料 10 年以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强烈的“爱国心”驱使容闳再度关注危难中的祖国。通过旧友蔡锡勇,容闳向湖广总督张之洞连上两策。不久,张之洞上奏朝廷,召容闳回国。年近七旬的容闳,去国 13 年后,再次得到朝廷的召唤,心中感慨不已,准备回国再干一番事业。1895 年夏,容闳回到上海,“购中国官场礼服,耗费不貲。”当时张之洞由湖广总督调署两江,容闳便直接到南京拜谒。可是,张之洞并不似当年的曾国藩那样真正“赏识”容闳,只是给了他一个江南交涉委员的“挂名差使”,即不再理会。稍后实授两江总督的刘坤一也是如此。容闳无奈,随即辞职,并声称从此“与江南政界断绝关系。”容闳既已回国,而得不到地方实力派的支持,速性再进一步,“拟游说中央政府”。他相继提出了一个国家银行计划和修筑津镇铁路计划,在原来的留学计划——教育救国失败后,试图进行实业救国,然而随即都化为泡影。容闳大失所望:“予之种种政策,既皆无效。于是予救助中国之心,遂亦至此而止矣。”^⑥此后,容闳积极参与了维新变法运动,不过,戊戌政变很快便使容闳逃亡上海租界。后来,他做了庚子中国国会的第一任会长,并最终走上了同情与支持反清革命的道路。

三、尴尬与限制

容闳之所以难以真正介入中国社会——他不能进入清朝政府的权力位置,甚至难以得到某些权势人物的真正接纳与支持,这主要是因为他的“洋学生”出身,与晚清中国社会仍然是以科举入仕的权力结构不相适应。尽管当时的中国亟需容闳这样的西学人才,但是,在他的“一技之长”被利用的同时,他遭到的是普遍的猜忌甚至敌视。早在 1878 年,容闳的美国友人吐依曲尔氏在耶鲁大学演讲时对容闳回国的境遇作了精当的描述:“那里(中国)除了卑微的亲属外,他没有朋友,不会给他任何地位和照顾,可以说,没有他立足之地。不仅如此,而且考虑到他在哪里(美国)呆过,成了什么人,想要干什么,他在本国人当中不可能不受到歧视、猜疑和敌对。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派阴郁险恶的前景。”^⑦容闳的这种“前景”

已如前所述 我们还可以从容阔经理的“留美幼童”的境遇提出佐证。

派遣留美幼童,是容阔“维新中国”的教育计划的核心。容阔深感到自己所受西方大学教育大有裨益,便希望有一批中国留学生长期在美国生活,系统地接受西学教育,以培养近代新型的西学人才。但是,这个计划“在保守的中国是太激进了。”^①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虽然支持容阔,但是他们的做法已与容阔的想法有了一段相当大的距离。他们严格规定了留美幼童必须“兼讲中学”和遵守中国礼仪,“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恭逢三大节以及朔望等日,由驻洋之员率同在事各员以及诸幼童,望阙行礼,俾娴仪节而昭诚敬。”^②可见,幼童出洋一开始便暗藏了以后所谓中学与西学之争的危机。

清政府派幼童留美,主要目的是培养洋务人才,但又过分担心他们的“洋化”,因此,对他们监督管教极严,不仅派有翰林出身的正监督,而且还有翻译与中文教习,并且要求他们对幼童“随时课以中国文义,俾识立身大节,可冀成有用之材。”^③即严格要求幼童的行为必须符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但是,幼童在美,呼吸了自由独立的新鲜空气,很快就“美化”了。守旧派对此攻击不遗余力,他们认为幼童“抛荒中学”,^④“腹少儒书,德性未坚”,^⑤“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固无论其学难期成材,即成亦不能为中国用。”^⑥幼童的“美化”,在他们看来,便“不复卑恭之大清顺民”,有成为“洋鬼”的危险。^⑦不但守旧派如此,即使开明如曾纪泽当时也认为:“幼童未读中国圣贤书,遽令远赴异域,专事西学,上之不过为美邦增添士民,下之为各埠洋行增添通事、买办之属耳,于国家无大益也。”^⑧幼童回国后,李鸿章的考语是:“洋气既深,华文太浅。”^⑨因此,他们不但“受到中国士大夫的杯葛和歧视”,被视为“洋鬼子和无益于国家的人”,^⑩甚至还“被视如重犯,北京当局屏之不用。”^⑪

对于幼童回国的境遇,容阔在回忆录中写道:“学生既被召回国,以中国官场之待遇,代在美时学校生活,脑中骤感变迁,不堪回首可知。”^⑫这无疑是容阔对“中国官场之待遇”深有感触的夫子自道。与“幼童”一样,容阔难以介入中国社会主要是因为他

的“洋学生”身份,这在传统士大夫的眼中便是中学修养的缺乏。如李鸿章认为容阔“汉文未深,又不甚知大体,亦是一病。”^⑬他甚至认为“容阔为人诚不如荔秋(陈兰彬)之颠扑不破。”^⑭因此,当年分别以陈兰彬、容阔为留美学生正、副监督就不足为怪了。李鸿章的解释是:“莼甫熟谙西事,才干较优;荔秋老成端谨,中学较深,欲使相济为功也。”^⑮好一个“相济为功”!这显然是要以陈兰彬之流作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表率限制留美幼童的“洋化”。

中国社会向来是重身份与地位的。在晚清中国,科举入仕的“功名”仍是传统士人的进身之阶。虽然容阔回国以后也极力想寻找机会接近达官贵人,以谋求进身之途。但是,他终生引以为豪的“耶鲁大学中国第一毕业生”的洋学生身份,以及他的信奉基督教、归化美国籍、甚至娶美妇为妻的行为,恰恰妨碍了他的各种努力的效果。比如他的剪辫易服,即“引起了许多同胞极强烈的责难和规劝”,^⑯何况其他!在这具有深厚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度里,“夷夏之辨”的观念根深蒂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过于“西化”的容阔终归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边缘人”,处境自然是尴尬的。

容阔在晚清中国的这种尴尬的人生境遇对他的事业有着严重的限制。我们知道,容阔虽然从小接受西学教育,但是他终生都有一颗炽热的爱国心,“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⑰容阔的“教育计划”,是欲“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⑱这是容阔毕生视如生命的事业。但是,在洋务派大员李鸿章等看来,幼童出洋,“仅筹办洋务之一端。”^⑲只不过是让他们学习西方长技,“为洋务海防储备人才。”^⑳显然,洋务派的目的与容阔有很大的差距。容阔不但得不到重任,只能出任副职,而且还受到多方面的猜忌与制约。如李鸿章就曾致函陈兰彬,对容阔“能和衷协力否”心存疑虑,^㉑而从陈兰彬到吴子登的历任正监督都对容阔的事业攻击破坏不遗余力,容阔的事业自然难逃失败的结局。从容阔后来的国家银行计划与修筑津镇铁路计划的失败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容阔不能进入清朝政府的权力结构,且不能得到实力派人物的真正支持,因此,也并没有人能真正理解他的爱国与报国的良苦用心,他的“维新中国”的理想只如一场春梦。

我们说,容阔难以介入晚清中国社会的尴尬境遇对他的事业是一种严重限制,那么,是否可以说法

如他能够介入就会使他的事业顺利发展呢?这个假设我们已经无法在容闳身上得到证明。不过,另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似可为之反证。在近代中国著名的历史人物中,就“西化”程度而言,能够与容闳相提并论的当首推辜鸿铭,然而,他们的思想与行为取向却大异其趣。如果说容闳平生致力于“西学东渐”,辜鸿铭则是刻意要反其道而行之。他从欧洲回国以后,便长期为张之洞作幕,混迹中国官场,折向儒家文化,甚至不惜身份而为辫子、八股、小脚、纳妾等“国渣”进行辩护,且在科举制度废除后五年的宣统二年(1910)接受清朝皇帝钦赐的第二名文科进士(第一名为严复)的头衔,堂而皇之地成为中国士大夫的一员,并终生为宣扬与捍卫中国传统文化而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为此,辜鸿铭付出了被人视为“怪物”或“怪杰”的代价。这个“怪”字颇有意味,也许正因此而使辜鸿铭能够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有一立足之地。容闳则不能。但是,容闳所开创的事业则预示了近代中国新的发展方向,以后一代代仁人志士致力于斯,前仆后继,以致于今天我们仍然要来隆重纪念他以及他的光辉业绩。历史的评判颇可耐人寻味。

注释①《自序》《附录:吐依曲尔氏之演讲》,《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9-165页。②⑥⑦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西学东渐记》,第66-68-42-43-58-59-62-70-71-72-78-88-95-99-100-126-147-154-144-124页。③《西学东渐记》第68页。容闳1835年进古特拉富夫人的“西塾”,但该“西塾”不久即“因故停办”,容闳“既还家,从事汉文”(《西学东渐记》第44页)。直到1841年进玛礼孙学校,其间有几年时间。容闳所称学过四年汉文,是否在这一段时期进过中国旧有的私塾呢?待考。④参见

今本《西学东渐记》前附插图《在耶鲁大学毕业时的容闳》照片。⑤⑥寿尔:《田凫号航行记》,《洋务运动》(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20-422页。⑧⑩⑪《附录:吐依曲尔氏之演讲》,《西学东渐记》第163-165-173页。⑫《曾国藩全集·日记》(二),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944页。⑬⑭⑮温秉忠:《一个留美幼童的回忆》,祁光熙:《游美洲日记》第267页附录,272页附录,274页附录,祁书为与《西学东渐记》合刊本,岳麓书社1985年版。⑯《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九日曾国藩等折》,《洋务运动》(二),第158-159页。⑰《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刻本,第40页。⑱《复陈荔秋星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九,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年影印光绪三十四年金陵刻本,第21页。⑲《光绪七年二月初六日出使美日秘国大臣陈兰彬折》,《洋务运动》(二),第165页。⑳《留美中国学生会小史》,《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十二号(1917年)。㉑《日记》卷一,《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47页。㉒《复黎召民京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二十,第24页。㉓《华人留学美洲之今昔》,《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十二号(1917年)。㉔《复郭筠仙星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七,第18页。㉕《论派员查办秘鲁华工》,《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二,第34页。㉖《论出洋肄业学生分别撤回》,《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十二,第7页。㉗《复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第32页。㉘《光绪三年九月十三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等奏》,《洋务运动》(二),第163页。㉙《复陈荔秋宗丞》,《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八,第20页。

责任编辑:凌杰]